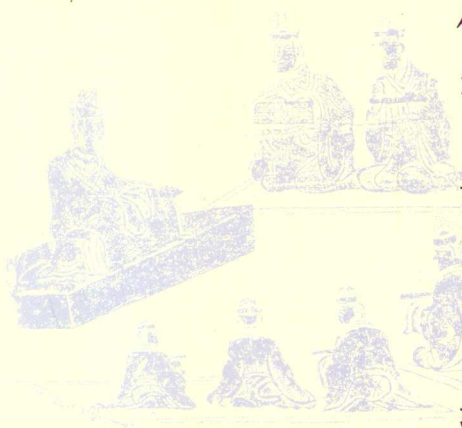


珞珈中国哲学

# 《春秋穀梁传》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秦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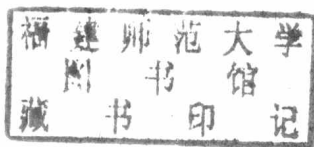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珞珈中国哲学

# 《春秋穀梁传》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秦平著



1042589



T1042589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穀梁传》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秦平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11

(珞珈中国哲学)

ISBN 978 - 7 - 101 - 08938 - 7

I. 春… II. 秦…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编年体②《春秋穀梁传》—研究 IV. 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2)第 225855 号

---

书 名 《春秋穀梁传》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著 者 秦 平

丛 书 名 珞珈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1½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938 - 7

定 价 54.00 元

---

## 珞珈中国哲学：通向未来 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的“一大事因缘”，就是新的知识分类体系的逐步确立。而在这一新的知识分类体系里，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传统的经史子集里分离出来。由于这样一个完全属于外来知识体系的新学科没有自己的历史及其固有的形态，在 20 世纪初期只能仿照西方的哲学学科体系来构造“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知识体系，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反向格义”（刘笑敢语）的思想史的创作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两代学人就中国哲学史教学体系与研究方法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哲学史观与方法论问题，展开了多次研讨争鸣，认真反省“中国哲学”学科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述了对中国哲学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其实，在 20 世纪初期，有关“中国哲学”概念的具体内涵，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诸先生都曾给出过自己的界定，如金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就区分了“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这二者的不同，而他本人则倾向于用一种没有“成见”的态度写一种“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 1961 年版）。而冯友兰先生本人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就明确地说，他是“就中国历史上各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明显地以西方哲学学科为标准来写一本“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史”。张先生则辨析了“中国人的哲学”与“中国系的哲学”的差异，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可以包括印度系的哲学如佛教哲

学,而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则主要是“中国系一般哲学”(《中国哲学大纲》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谈论“中国哲学”问题,有一个不容抹杀的思想史事实,那就是:20世纪的现代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在这样的历史起点上谈“中国哲学”问题,就无法回避已被纳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西方哲学思想,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而言,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则是一个短期发展的结果,但它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却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方向性意义。中国文化究竟该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论争已经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就是立足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广泛吸纳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走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偏离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方向,也将走一条“综合创新”的道路;而如何“综合创新”,则将是言人人殊,各有胜途。

武汉大学地处中国大陆中部,是全国少数几个比较有名的以文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哲学学院在全国哲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可,是比较少有的学科齐全、学术传统深厚的哲学教学与科研单位之一。其中,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在大陆得到同行专家们的首肯与赞誉,在国际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我们这个中国哲学研究群体,是以萧蓬父、李德永、唐明邦、陈修斋、杨祖陶、刘纲纪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为第一代开创者,强调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主张德业双修;以史论结合、古今贯通、中外对比为宏观研究构架,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契机与生命力为基本学术出发点,平章儒道墨释,涵化中印西马,认定明清之际为中国学术与文化的近代性的生长点,吸收并扬弃了梁启超、钱穆、侯外庐等人有关明清三百年学术研究的思想成果,将中国文化“自万历到‘五四’的三百多年的自我更新历史看作是一个同质的近代文化的运动过程”,从而论定,中国文明在世界性的由国别史向世界史迈进的进程中,是少有的几个具有原生、内发现代文化形态的主要文明形态之一。在第一代学人开创的事业基础之上,第二代、第三代学人,一方面深化前辈学者的许多固有的学术

问题,另一方面也根据新的学术发展情况,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现代新儒家思想研究、新出简帛文献中的哲学思想、佛教禅宗哲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进一步地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进一步地走进中国。中西比较哲学也将成为本哲学研究群体新的生长点。

本套丛书,主要展示了近几十年来在珞珈山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二代、第三代部分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中部地区最新进展的大致轮廓。丛书以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其中有少量涉及中西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学思想。这些内容反映了珞珈中国哲学第一代学人“汗漫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宏伟学术理想,正在第二代、第三代学人的学术活动中慢慢地实现着。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在当前的语境下谈“中国哲学”,可以分成“中国人的哲学”和“在中国的哲学”两大类。所谓“中国人的哲学”,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哲学,而“在中国的哲学”,则是指来自西方、印度等域外而在中国被传播、接受、研究的哲学。“中国人的哲学”当然离不开“在中国的哲学”,但又不完全依赖于它,而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问题,乃至当今世界的问题,依据自己民族的固有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思想资源,提出一整套哲学的解决方案或思想方案。这便是“中国人的哲学”的主要内涵。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珞珈中国哲学,是一条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之路。它揭示了这样一种学术理想:居住于珞珈山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将努力依据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的思想资源,创造出一种“中国人的哲学”。这是一个目标,是一种学术理想,目前的这套丛书与此目标和理想还相差很远,但可以看作是通向此目标与理想的一级台阶。

是为序。

吴根友

2008年2月4日

# 目 录

## 《春秋穀梁传》研究

|                               |       |
|-------------------------------|-------|
| 20 世纪以来国内《春秋穀梁传》思想研究之综述 ..... | (3)   |
| 《春秋穀梁传》“天论”初探 .....           | (18)  |
| 祖先崇拜与天命信仰                     |       |
| ——以《春秋穀梁传》为视角的古史观察 .....      | (32)  |
| 试论春秋的世子制度 .....               | (48)  |
| 尊周:《春秋穀梁传》政治秩序重建的起点 .....     | (58)  |
| 浅析《春秋穀梁传》的“内鲁”思想 .....        | (75)  |
| 《春秋穀梁传》华夷思想初探 .....           | (84)  |
| 《春秋穀梁传》时间观念探析 .....           | (95)  |
| 《春秋穀梁传》重民思想探析 .....           | (108) |
| 《春秋穀梁传》夫妇伦理刍议 .....           | (120) |
| 析论《春秋穀梁传》兄弟伦理 .....           | (132) |
| 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的解释学意义 .....       | (143) |

## 中国哲学史研究

### 个体的发现与探索

|                 |       |
|-----------------|-------|
| ——孔学新探 .....    | (157) |
| 庄子生死观刍议 .....   | (170) |
| 王弼与魏晋有无之辩 ..... | (211) |

|                          |           |
|--------------------------|-----------|
| 东莱学及事功学对理学的调和与批评 .....   | (224)     |
| 萧萐父先生“明清启蒙”学术史观之演进 ..... | (268)     |
| 传统与现代化之间                 |           |
| ——萧萐父先生“历史接合点”思想初探 ..... | (279)     |
| 近二十年熊十力哲学研究综述 .....      | (286)     |
| 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 .....       | (299)     |
| 儒家文化: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 .....  | (313)     |
| 《儒家知识一本通》序言 .....        | (320)     |
| 开放的儒学与重建主体性的文化价值         |           |
| ——评《中国儒学之精神》 .....       | (326)     |
| 一场关于“亲亲互隐”的论战 .....      | (329)     |
| 连续性与时代性的贯通               |           |
| ——读《中国庄学史》 .....         | (331)     |
| <br>附 录: 秦平主要著述目录 .....  | <br>(335) |
| 后 记 .....                | (337)     |

# 《春秋穀梁传》研究



## 20 世纪以来国内《春秋穀梁传》 思想研究之综述

作为“《春秋》三传”之一,《春秋穀梁传》(以下简称《穀梁传》)曾在西汉宣帝统治期间盛极一时,被立为官学;后于唐代被列入“九经”,至宋代正式位列“十三经”。可以说,两千多年来,《穀梁传》一直是中华传统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其所蕴涵的丰富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与伦理哲学价值,均不容抹杀。但是,与《春秋公羊传》(以下简称《公羊传》)和《春秋左氏传》(以下简称《左传》)的研究相比,《穀梁传》研究无疑逊色了不少,无论在研究者的规模方面,还是在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方面,均远远不及《公》、《左》二传。

不过,自晚清今古文经学的滥觞、民国古史辨派运用新学科方法研究《穀梁传》以来,已经先后有学者从经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对《穀梁传》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现代《穀梁》学研究的一个相对繁荣的高潮。

总观 20 世纪以来的国内《穀梁》学研究成果,其主要集中在《穀梁传》的思想史定位以及《穀梁传》的思想价值等方面。本文拟对此作一番梳理,以期对《穀梁传》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 一、围绕《穀梁传》的思想史定位所展开的论辩

《穀梁传》在思想史、经学史上如何定位?这是研究《穀梁传》思想的前提和基础。这一主题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如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孔子与《春秋》的关系、《穀梁传》与《春秋》的关系、《穀梁传》的作者、《穀梁传》与《公羊传》的关系、《穀梁传》的成书与流

传情况,等等。20世纪以来,不少中国学者围绕这一主题的诸项子题各抒己见、论辩诘难,提出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见解,使相关研究和认识不断清晰与深化。

### (一)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孔子与“六经”是否有关?如果有,又是什么关系?解答这些疑问是人们理解“孔子与《春秋》之关系”问题的前提和背景。学者们对这些疑问的回应,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以皮锡瑞为代表,主张“六经”皆为孔子所删定。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皮锡瑞坚信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明白了“道之不行”,故退而删定“六经”,寓微言大义于其中,以作为万世之准则,“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皮锡瑞称孔子之所以贤于尧舜,甚至为生民以来所未有者,都是因为他删定了六经。所以,“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sup>①</sup>。蒋伯潜的观点与皮氏相近,亦主张“五经”与孔子有关,其中有孔子的“微言大义”存焉,故孔子是经学的开山之祖<sup>②</sup>。

第二种观点的代表、古史辨派的重要学者钱玄同完全反对皮锡瑞的主张。钱玄同根本否定了“六经”与孔子的关系,提出若要想求得真正的孔学,要考察孔子的学说和事迹,只可依据《论语》。甚至《孟子》、《荀子》、《史记》中所述的孔学,都只能说是孟轲、荀况、司马迁之学而已,更毋论今文与古文经学了。在1923年写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钱玄同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孔子与“六经”关系的看法:(1)孔丘并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2)《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至于《乐经》更是子虚乌有、从无比书);(3)因《论语》偶然提到诗、书、礼、乐,就先后有《史记·孔子世家》、《礼记·王制》、《孟子》等文献敷衍出“孔子作六经”之说;(4)实际上“六经”的配成是在战国末期的事情,首见于《庄子》的《天运篇》和《天下篇》;

①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新1版,第1—7页。

② 详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5—6页。

(5) 自“六经”之名成立,后学多将六者并举,而且还扯上“五行”、“五常”等话头来比附<sup>①</sup>。

第三派观点是由周予同先生提出的。他首先考察了上述两派的意见,指出:钱玄同从“疑古派”的怀疑精神出发,全盘否定了“六经”与孔子有关系的说法,钱氏的见解固然有其独到之处,但他的立足点却是有所问题的,因为他是对这个问题先存在否定的意见,然后再去从古代文献里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难以避免主观主义的毛病;不过,钱玄同所代表的“新古史学者”以怀疑精神重理中国古代史,其“六经孔子关系论”体现了近代经学研究的新途径。至于皮锡瑞等今文经学家,他们坚信孔子怀抱着伟大的政治理想,并以“六经”为孔子思想所托,还可以说有一定道理;但其所信奉的“六经致用”、“孔教救国”,则更像是荒谬的鬼话,完全说不通。周予同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六经”决非撰于一人、成于一时、作于一地。在孔子以前,必定有很多古代文献遗存下来,其中的一部分就残存在“经书”之中。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立学校的教育家,孔子很可能对这些文献重新整理过,用作教授学生的教本。所以现存的“六经”,是经过孔子整理的,也因此而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不过,孔子对“六经”尽管有所删节,但他的基本态度是“信而好古”,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文字、史事和风格;并且,今天看到的“五经”已经不完全是孔子整理后的原书,而是既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了一部分,又掺杂有后来儒家学派增添的内容<sup>②</sup>。

## (二)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问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春秋》价值的评判,是研究《春秋》以及《穀梁传》首先碰到的、不可不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一时期的学者在此问题上的争论更加激烈,形成了多种意见。

皮锡瑞坚持认为《春秋》是孔子创作的一本治世大典,“说《春秋》

①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收录在顾颉刚等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69—70页。

②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15—218页。

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抄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皮氏此说实际上继承了孟子的“孔子作《春秋》”之说。皮锡瑞又详细描述了孔子作《春秋》的过程:《春秋》原本是鲁国旧史,只有史事的客观记载而没有更深刻的意义,而孔子忧“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因此“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志,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孔子对《春秋》加以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使乱臣贼子惧。所以,皮锡瑞认为孔子之作《春秋》比起删订其他诸经意义更为重大,甚至可以与大禹治水、周公平乱相媲美<sup>①</sup>。蒋伯潜亦持“孔子作《春秋》”之说<sup>②</sup>。

晚清古文学派大师章太炎认为“六经”乃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故“六经”是“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章太炎不同意今文学派的孔子“作”《春秋》之说,他主张“六艺皆周公之政典”,“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世传“夫子作《春秋》”之说,其实孔子只是“议而不断”、“不自为赏罚”。因此,孔子之“作”《春秋》,实为“修”《春秋》<sup>③</sup>。

徐复观先生也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修”而非所“作”,但他不赞同古文学派“以《春秋》为史”的看法,认为孔子修订《春秋》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今日所谓的“史学”,而是在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因此,孔子修《春秋》的用心是超乎史学之上的,《春秋》是经而不是史<sup>④</sup>。

钱玄同则继续贯彻古史辨派的怀疑精神,依据《论语》中“关于《春秋》的话,简直一句也没有”,来证明《春秋》决非孔子所作或所删

①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之四《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版,第2—4页。

② 详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5页。

③ 《文史通义》卷一《经解》,见[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版,第93—112页。

④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56页。

修。钱玄同认为《春秋》只能是一部历史,具体说,是一部鲁国的“断烂朝报”,不但无所谓“微言大义”,并且是没有组织、没有体例、不成东西的史料而已。用他的话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所以,它绝不是孔二先生做的,以孔夫子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sup>①</sup>。

顾颉刚先生对钱玄同的观点做了补充和修订,主要是推测了“《春秋》何以说为孔子所作”的几个步骤,认为《春秋》本是鲁国史官所记的朝报,本来就有阙文和疏漏之处;等到孔子劝人读书,教育学生,但当时实在没有多少书可以读,只好把这鲁国所独有的史料拿来让七十子后学读;后来,儒家尊孔子,就把《春秋》截在孔子去世的时候为止了;而随着《春秋》的地位渐高,甚至有人一定要说《春秋》是孔子作的,并且硬要从里面找出孔老夫子的“微言大义”来。所以,《春秋》不是孔子作的,孔子只是借用它作为教材来教授学生;《春秋》里面也没有孔子的什么“微言大义”。但这并不是说《春秋》就没有任何“义例”了,《春秋》当然不可能处处有微言大义,但著作《春秋》的那些鲁国史官们秉笔而书,自然有它的体例,所以从中推出些义例来也不足为奇,只是不能一股脑把账全都算到孔夫子头上<sup>②</sup>。杨伯峻先生仔细考察了今本《春秋》的文字,认为:“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国史的通名,后来专指鲁国的史书;现存《春秋》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春秋》本身前后笔调不一致,说明孔子寓“微言大义”于书中的说法不可信。《春秋》与孔子有一定关系,表现在孔子曾经将官书《春秋》作为教本教授学生,并使它传到民间;后来孔门弟子为纪念孔子,特意在书中加上了他的生卒年<sup>③</sup>。持相似观点的还有朱自清和赵伯雄<sup>④</sup>。

钱穆先生委婉地批评了钱玄同“只可依据《论语》考察孔子的学说和事迹”及“依据《论语》中没有关于《春秋》的话来证明《春秋》决非

① 钱玄同:《论〈春秋〉性质书》,《古史辨》第一册,第275—276页。

② 顾颉刚:《答书》(1925年3月21日),《古史辨》第一册,第276—278页。

③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经书浅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第70—74页。

④ 详见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版,第41—43页;又见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8页。

孔子所作或所删修”的观点。通过历史地考察《春秋》在各个时代的影响和地位,钱先生得出结论:《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孔子平日言行的一部书,而《春秋》则是孔子自己的著作,而且是孔子晚年的、唯一的一部亦经亦史的著作<sup>①</sup>。

周予同先生对“《春秋》”和“《春秋》学”做了分梳,指出《春秋》本身是一部很平常的史书,是中国古代初期的历史著作,因为受到当时物质的和意识的限制,只能形成这样一部东西。但是,《春秋》何以影响中国的政治、法律及社会思想如此深远?周予同认为,这不是因为《春秋》本身有什么“微言大义”,而是由于后人研究《春秋》、利用《春秋》而形成的“《春秋》学”所造成的<sup>②</sup>。

姚曼波则通过清理孔子与《春秋》、《左传》的关系,考察孔子作《春秋》的文化渊源与历史条件,比较《左传》、《论语》、《国语》在思想倾向、史料、语言风格、虚词文法等方面的异同,得出了一个新颖的结论:孔子确实著过《春秋》,但他所著的《春秋》并不是前人所说的和今天流传下来的《春秋》,而是一部独立的著作,是今之《左传》的蓝本;孔子《春秋》的原貌是一部记载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实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史学著作;左氏割裂了孔子《春秋》,并加入逐条解经语而形成了今本的编年体的《左传》<sup>③</sup>。

谢金良主要讨论了“《春秋》是否含有微言大义”的问题,指出:如果《春秋》不含有微言大义,则《公》、《穀》二书就是后人编造杜撰出来的,这与二传文本体现出的作者的才华不相称。所以,可以从《公》、《穀》二传反推出《春秋》应当含有一定的微言大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春秋》里的每一条都表现了圣人的“微言大义”;而且,现有的史料只能说明《春秋》与孔子的学问有关系,还很难断定《春秋》的所有“义例”都是出自孔子。因此,一方面要承认《公》、《穀》之书专讲“微言大

①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新1版,第263—317页。

②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493—498页。

③ 姚曼波:《孔子作〈春秋传〉史实考》,《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7期,第88—92页;又见姚曼波:《〈春秋〉考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7—41页。

义”并非全凭牵强附会杜撰出来,而是源有所据的;另一方面,尽管孔子可能对《春秋》一书有着自己特殊的见解,但不能简单认为《春秋》的全部义例一定出自孔子<sup>①</sup>。

### (三)《穀梁传》与《春秋》的关系

在《穀梁传》与《春秋》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分歧也很大,概括起来有四种观点。

不少学者继承了传统的“《穀梁》今文说”,认为《穀梁传》同《公羊传》一样,都是为解释、阐发《春秋经》里孔子的“微言大义”所作的传。皮锡瑞是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sup>②</sup>。

晚清学者崔适撰《春秋复始》一书,认为《穀梁传》并非今文学,而是古文学,是由刘歆伪造的,目的是用来为同样由他伪造的《左传》张目<sup>③</sup>。张西堂先生进一步发展了此说,通过梳理《穀梁传》文本,他指出:《穀梁》有无经之传,有不释经之传,《穀梁》义例多相乖戾之处,文辞多重累之处,《穀梁》晚出于《公羊》,不合于鲁语,违反孔子之意,乃杂取传记以成等种种证据,论定《穀梁传》亦为古文之学,“盖本杂取传记以造,非得《春秋》之真传者也”<sup>④</sup>。

周予同则贯彻了《穀梁传》“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精神,在考订各家之说的基础上,提出:崔氏的立论虽然还没有得到一般学者的承认,但《穀梁传》的作者问题无明文可考,实在是不容讳言的。换言之,《穀梁传》与《春秋》的关系问题,在目前只能是暂付阙如<sup>⑤</sup>。

谢金良具体考察了崔适以《穀梁传》为古文学的几个证据,认为崔适的论证并不能成立,《穀梁传》仍应当属于今文学。接着,谢金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穀梁传》一定有其渊源,其源头很有可能是子夏所传的《春秋传》;而这部《春秋传》并不见于史册,在此专指传说中

① 谢金良:《〈穀梁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福建论坛》,1996年第2期,第9—13页。

②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23页。

③ 参见张西堂:《穀梁真伪考》,台北:明文书局,1994年第1版,第72—76页。

④ 张西堂:《穀梁真伪考》,第1页。

⑤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264—265页。